

理性选择理论 的病变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政治学应用批判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自从1951年阿罗出版了《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以来，理性选择学术研究在政治科学领域得到急剧的发展，然而，在此之中也存在着为这本书的形成提供机遇和动机的出于好奇心的推论。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的理论推敲过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分析上所遇到的巨大的挑战吸引了大量的一流学者；其结果，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愈来愈复杂，且具有较辩性。另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在经验上应用的成功事例屈指可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理解和解释这种使经验性研究相对死亡的原因。我们的批评不是要挑战理性选择理论家科学地研究政治的热情。正相反，我们赞赏理性选择研究项目背后的动机。我们期望本书能引发理性选择理论家与政治学的其他学者之间的对话。

格林 (Donald P.Green)
沙皮罗 (Ian Shapiro) 著
徐湘林 袁瑞军 译
徐湘林 校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性选择理论 的病变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政治学应用批判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格林 (Donald P. Green)

沙皮罗 (Ian Shapiro) 著

徐湘林 袁瑞军 译

徐湘林 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Orthodox Chines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 Limited
本书中文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初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4-0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 政治学应用批判 / (美) 格林,
沙皮罗著; 徐湘林, 袁瑞军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4. 5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5633-4595-7

I. 理… II. ①沙…②徐…③袁… III. 政治学
—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05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65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0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8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社会与思想丛书缘起

· 甘 阳

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从 1992 年起开始出版中文书籍。这或许预示着：中文这一为十多亿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中将会日益取得其应有的地位。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决定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俾更有系统地积累有价值的中文学术著述和译述，我们希望，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与思想”丛书将首先着重于对中国本土社会与本土思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诚如人们今天已普遍意识到的，晚近十余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并非仅仅只是相对于 1949 年以来甚至 1911 年以来而言的变迁，而是意味着自秦汉以来既已定型的古老农业中国，已经真正开始了其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这一历史巨变已经将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到了中外学者的眼前，例如，乡土中国的这一转化将会为华夏民族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基层生活共同体？什么样的日常生活结构？什么样的文化表达和交往形式？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方式和社会经济网络？所有这些都历史性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基本课题，同时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国传统性”再获新生的历史契机。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已经为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可能与坚定的经验基础，因为它一方面使人们已能立足于今日的经验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已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去再度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性。有鉴于此，本丛书将不仅强调对当代中国的

研究,同时亦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张大“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资源。

“社会与思想”丛书的另一方面则是同时注重对西方社会与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经济领域,所谓“福特式大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促发对“后福特时代生产”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福特式生产”的历史成因及内在缺失;在政治领域,西方现存体制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发展的尖锐张力,已重新激发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 vs 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这一基本辩论;在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但已经全面动摇近代西方苦心营构的文化秩序和价值等级,而且更进而对“西方传统性”本身发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样要全面重新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本丛书将不仅包括对当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强调对西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西方传统内在差异性的研究。

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与思想”,自然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对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应该日益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干。从学科的角度讲,亦即希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人文及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与跨学科的研究去深入认识中西现代性与中西传统性,以往那种僵硬的“传统 vs 现代”、“中国 vs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将会真正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学术界为此任重道远!

序言

自从 1951 年阿罗 (Kenneth Arrow) 出版《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以来,理性选择学术研究在政治科学领域得到急剧的发展,然而,在此之中也存在着为这本书的形成提供机遇和动机的出于好奇心的推论。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的理论推敲过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分析上所遇到的巨大的挑战吸引了大量的一流学者;其结果,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愈来愈复杂,且具有狡辩性。另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在经验上应用成功的事例屈指可数。大多数早期的理性选择著作,不是压根儿没有经验性研究,就是只是粗糙的或印象式的。令人惊讶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这些缺陷竟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当我们开始这一研究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理解和解释这种使经验性研究相对死亡的原因。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揭示了在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人物之间进行的备受指责的有关理性选择理论功绩的辩论。这些研究者的辩论是在深奥的专门性词汇的范围内进行的,其他人总是一头雾水。批评者往往是在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对理性选择的研究途径一概抹煞或者大肆宣扬对它的藐视。他们否定理性选择理论家的假设或其科学的志向,或者在根本的方面误解了它。不足奇怪,研究者基本上对理性选择理论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我们打算以理性选择学术研究所表述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评估。我们不是要挑战理性选择理论家科学地研究政治的那种远大

志向,我们也不排斥理性选择模式所依据的假设。我们承认理性选择对其他研究政治的模式的大量批评,也注意了解有关理性选择模式巨大成就的文献,这些文献是从阿罗、唐斯(Anthony Downs)和奥尔森(Mancur Olson)等的经典著作中发展而来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从政治学中学到了什么?

因此,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经验性理性选择文献,并且逐渐地得出我们的观点,即我们几乎没有从理性选择理论那里学到什么。部分的困难出自于其经验性应用的绝对贫乏;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最有兴趣的似乎只是进行理论的推敲,而把经验性检验的烦琐工作留给了将来或者其他什么人。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就我们看来,经验上的失败主要来源于理性选择理论家想要创立政治学普遍理论的远大志向。我们认为,作为这种志向产生的结果,理性选择理论所期望的经验性研究的主体一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许多缺陷。

我们认为,除非认真诊断方法论错误的并发症并且重新思考普遍主义的远大目标,否则情况将不会改善。在本书的各章中,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指出了什么样的改变是适宜的,以及评述了我们关于改进的建议将会为今后的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在分析中得出的大部分判断可能是消极的,但是,我们打算使这一方法论上的批评能成为改进政治科学中经验性研究质量的建设性努力中的一部分。

对那些圈外人来讲,理性选择的结构体系是令人费解和困惑的;不精通它深奥的术语和方法常常使非专业人员不能理解——单独评估——在理性选择模式下提出的主张。我们写作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诊断这些事情的状态。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论点并不是生来就很难理解,理性选择理论也没有什么理由非要保持对政治科学中非专

业人员的深奥莫测。因此,虽然本书不是教科书——卢斯和雷法(Luce and Raiffa 1957)、赖克和奥德舒克(William Riker and Ordeshook 1973)、奥德舒克(Ordeshook 1986, 1992)、缪勒(Mueller 1989)、迈尔森(Myerson 1991)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仍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通俗地解释理性选择的基本概念,并且用非专业人员也能理解的方式展开我们的批评。

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引发理性选择理论家与政治学的其他学者之间的对话。批评家常常被忽视,因为他们全盘否定理性选择范式,因此没有余地进行理性选择和政治学中其他解释方法之间建设性的交流和综合。因为同样的原因,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的许多缺陷来源于这些理论所具有的封闭和内向的特征。理性选择理论化太多地依靠其内行之间的争论来推动,太少地依赖于社会科学家传统上试图理解的政治现象。我们抛砖引玉,希望讨论能继续下去,我们增加了结论的一章,在这一章里,根据从一些学术研讨会或者私人信件中得到的反馈,我们回答了理性选择理论家可能会向我们提出的反驳。

我们在本书中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一词是广义上的,相当于在相关文献中使用的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理性行动模式、实证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的经济研究途径等术语。我们通常遵循理性选择专业人员讨论中所接受的定义,当这些专业人员中对理性选择的意思有不同看法的地方,我们将讨论其不同看法的原因和含义。本书中所有的引文都是一字不变地引用,引文中的黑体字也都是按原文标出。

我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方面的大力帮助。我们尤其要感谢的是希克勒(Eric Schickler),他在本计划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研究助理并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服务。我们也非常感谢海沃

德(Clarissa Hayward)和西恩盖特(Adam Sheingate),他们在后来参加了这一研究计划。我们的一些同事、朋友和批评家阅读了本书许多章的无数次草稿并提出意见。在此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是: Bob Abelson, Bruce Ackerman, Steve Brams, David Cameron, Jack Citrin, Bob Dahl, Robyn Dawes, David Epstein, Bob Erikson, John Ferejohn, Mo Fiorina, Alan Gerber, Mitch Green, Jeff Isaac, Dnnny Kahneman, Keith Krehbiel, Bob Lane, Joseph LaPalombara, David lumsdaine, Sylvia Maxfield, David Mayhew, Sharyn O' Halloran, Barry O' Neill, Chick Perrow, David Plotke, Doug Rae, Susan Rose - Ackerman, Debra Satz, David Schmditz, Norman Schofield, Jim Scott, Steve Skowronek, Rogers Smith, Edward Tufte, Mike Wallerstein, Alex Wendt 和 Aaron Wildavsky。

本书最初稿件的不同版本曾分别提交给 1993 年 2 月举行的耶鲁大学政治理论专题讨论会;1993 年 3 月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与经济科学学会联合举行的公共选择学会的年会;1993 年 3 月在纽约举行的社会经济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 年 6 月在纳瓦达州塔胡湖举行的西部经济学会第 68 次年会以及 1993 年 9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年会。参加这些学术会议的许许多多的人(很难在此一一列出)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我们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特别要感谢耶鲁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所和国家科学基金(Grant SBR - 9357937)所给予的赞助。我们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科维尔(John S. Covell),他从一开始就对我们的计划感兴趣并给予支持。最后,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两人的眷属,她们对我们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每日出现的兴奋情绪给予了诙谐的容忍。

目 录

序 言	1
第1章 政治学 and 经济学中的理性	1
第2章 理性选择理论的性质	17
第3章 方法论上的病症	45
第4章 投票的悖论	64
第5章 社会困境和搭便车	98
第6章 立法行为与投票悖论	134
第7章 竞选的空间理论	199
第8章 对可能的批评的反驳	242

第1章

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理性

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就如在经济生活中一样,常常为稀有的资源而竞争。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商品的市场竞争与政治上的政治竞争的共存现象使得越来越多的政治科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方法也许可以被用来研究政治。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一书可算是这一观点的经典论述。该书认为,在研究政治时,人们可以假定,或至少把它作为一个起点,“议员或任何个人在参与市场和参与政治时的行动都是基于同样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p. 20)。之后,塔洛克又对这一逻辑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写道:“投票人和消费者在本质上是同样的人。史密斯先生既购物又投票;不论是在超级市场还是在投票亭他都是同一个人。”(Tullock 1976, p. 5)布坎南和塔洛克以及那些在发展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中追随他们的人们希望,“从人性的这种单一性观点出发,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有条理的和统一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观点”(Alt and Shepsle 1990, p. 1)。奥德舒克在一次对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全部成就的评价中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导致了在

一种共同范式和推理结构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重新整合,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Ordeshook 1993, p. 76)

虽然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交叉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作为现代理性选择理论标志的各种研究途径的典型融合则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①当时,理性选择理论仅是政治科学学科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主导政治科学研究的是制度分析、行为主义方法和以团体为基础的政治学多元主义理论。^②现在,理性选择理论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种只有内行才懂的神秘感已成为过去。它的论著经常在学科的重要刊物上发表,在学科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在所有重要的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都能找到它的支持者。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政治理论和美国政治的范围。首先,它进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而在最近,它已经扩展到比较政治的领域。实际上,在政治学中几乎已经没有未受过它影响的领域。图1.1展示了自1952年以来每隔五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理性选择文章数目,从中可以看出理性选择理论化的稳定发展趋势。在1952年,理性选择论著在这一学科的核心刊物上没有踪迹,而40年后它的论文在该刊物的

① 无论如何,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已具有根基。早在1929年,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已经在为消费者而展开的市场竞争和为选票而展开的政党竞争之间进行了比较。这种关于民主的思考方式在熊彼特(Schumpeter 1942)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得到具体体现。熊彼特争辩道:传统民主理论的有关参与和公共物品的先决条件应该摒弃,取而代之的模式应该是把政治领导人和政党看作是生产“政府输出”产品的公司——为争取选票就像公司争取市场占用额一样。

② 有关政治科学正统派别对早期理性选择理论家的反应,可参见熊彼特(Schumpeter 1942, pp. 250-268)和奥尔森(Olson 1965, pp. 98-131)。

总数 41 篇文章中占据了 15 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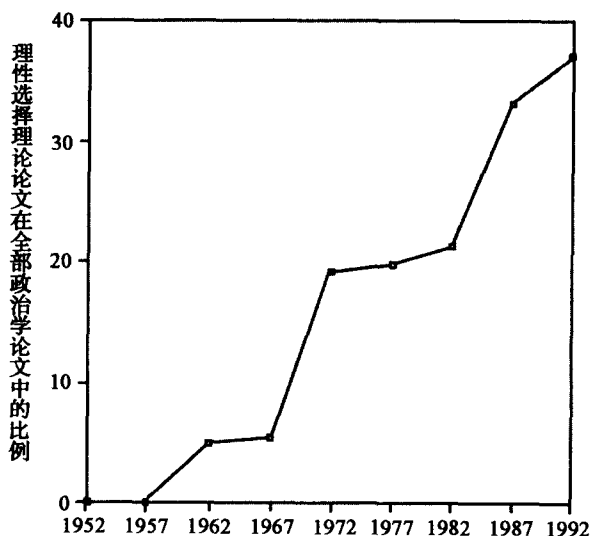


图 1.1 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理性选择文章

许多人把政治学研究的这一转变理解为理性选择理论已取得的胜利。例如,赖克(Riker 1990, pp. 177 - 178)坚持认为,政治科学中的唯一的真正进步就是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其他人虽然没有走那么远,但是他们屈服于理论成就的导向而将理性选择理论当作文集介绍和论文评论的标准。奈特(Jack Knight 1992, p. 1063)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社会生活中制度作用的理

① 这一数字可能不确切,因为有些文章很难分类。技术上的非理性选择的文章很容易与理性选择文章混淆,西蒙(Herbert Simon 1992)的抱怨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抱怨洛伊(Theodore Lowi)把他的文章错误地归类为理性选择的论著,把格林(Green 1992)错误地认定为部分的理性选择学者。除去那些故弄玄虚和似是而非的例子,理性选择学派在学科中的发展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解”。卡弗卡(Gregory Kavka 1991, p. 371)说,“理性选择经济模式的扩展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政治学领域那样广泛或那样成功”。门罗(Kristen Monroe 1991, p. 2)把理性选择描述为“政治和社会科学中主导范式之一,提供了具有洞察力的、严谨的和非常节省的解释”,而艾贝尔(Peter Abell 1992, pp. 203 - 204)则主张社会科学家接受理性选择理论,其部分理由是它在政治科学中的许多“几乎没有必要提醒”的成就。

理性选择理论家绝不是第一个试图通过假设投票人和政治家都是利益或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来解释政治现象的人,不过,在这方面的早期研究并不那么正式,也不那么使人印象深刻。^① 理性选择学派的不同在于系统的方法,由此得出有关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的命题。在解释政治结果的努力中,理性选择理论家求助于对个人面临的动机、限制和计算的推理解释。对个人的战略性行为进行系统分析式的调查,这引导理性选择理论家以创新的方式探讨政治科学的传统问题和询问以前没有涉及的关于政治现象的本质的一些问题。他们并不坚持认为传统的政治科学家研究的是错误的现象,而是认为,由于忽视了微观基础的逻辑,传统政治科学家以错误的方式研究正确的现象。

理性选择理论的出现于政治科学学科中重新造就了智慧的远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模式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关于多数统治逻辑的命题,例如,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即民主机构可能

^① 见摩根索《国际政治学》(*Politics Among Nations*),比尔德《宪法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卡尔霍恩《政府专题论文集》(*Disquisition of Government*)和《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且不提马克思的《剩余资本》(*Abundant Corpus*)和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

在许多方面是非常低效率的,是迄今为止不能引以为豪的。这些分析的结果至少开辟了三条相关的研究线索。已有文献的第一个部分是探讨民主程序的不连贯性和策划能原则上使其治愈的制度改革(Riker 1982)。研究的第二条线索是用20世纪50年代分析的结果来解释政治领域中各种各样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是政治科学家没有解释或至少没有很好解释的。飘浮不定的政策制定方式(Riker 1992),系统性的通货膨胀(Nordhaus 1975)、财政赤字(Buchanan and Wagner 1977)以及持续的公共部门的扩充(Meltzer and Richard 1978, 1981; Peltzman 1980)都被解释为与民主制度武断的和可操纵的特点有关联。最后,理性选择早期的关于多数统治逻辑的发现激发了对规范的民主基础的新的反应。如果明显的多数常常是幻想,如果少数可以操纵民主决定的规则以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如果没有办法把个人的愿望融合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要求的“普遍意志”,那么,民主的性质和愿望就要进行重新的评价(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Brittan 1977; Riker 1982)。

理性选择学派也为政治科学家研究民主制度中的动力带来了新方法。资历规则和委员会任命(McKelvey and Riezman 1992; Cox and McCubbins 1993),民选官员控制官僚层的方法(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 Weingast 1984),官僚层自身内部结构和特征(Moe 1989),以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Nordhaus 1975; Lindbeck 1976; Tufte 1978),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这些民选官员常有的特征:保住工作和保护实力范围的冲动。对政客适用的事也适用于政治组织和选民。在多数理性选择的解释中,政党试图最大化他们选举胜利的机会而不是什么特殊的意识形态议程,而选民则寻求通过政治过程来最大化个人利益。人们对竞选投入时间和金钱不仅仅像许多

政治科学家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实现公民责任感和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感情需要(Hedges 1984)。而相反,理性选择理论家坚持认为,人们对竞选的捐献常常应该理解为市场交换,他们通过捐赠来“投资”以换取政治候选人当选后从其许诺中得到“收益”(Snyder 1990)。虽然许多这样的认定可以与过去已有的关于政客和选民的观点相符,但是理性选择理论家是以谨慎和周密的方式创立这些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而这正是政治科学家至今没有做过的事。通过研究政治行动者在各种各样结构安置中的动机逻辑,理性选择理论家已经找到了丰富我们理解政治性质以及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和限制的方法。

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

在理性选择运动的这一成功的气氛下产生了这样一种环境,它使关于选举、委员会,以及战争和威慑的博弈论模式充斥于政治科学刊物;而且出版界的编辑们热衷于追寻该领域的实践者尚未完成的手稿(Ordeshook 1993, p. 74)。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理性选择学科的发展没有依赖于已经可以确认的一系列经验上的成功。麦克凯尔维和罗森塔尔(McKelvey and Rosenthal 1978, pp. 405 - 406)提出,虽然博弈论对政治科学的重大影响达到了“理论上的水平”,它却很少导向对“真实世界中政治行为的周密分析”。一年以后,费奥利纳(Fiorina 1979, p. 48)讥笑地说,仔细考虑理性选择理论的经验性成就“有一点儿像仔细研究纳玛斯(Joe Namath)的没有价值的成就”,在过渡期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变化。在评价立法政治时,克雷比尔(Krehbiel 1988, p. 259)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几项重大的进展产生了空间模式的有用性和可视性”,但是,他也承认,经验性的成

功目前仍然难以确定。而且,从拉尔曼、奥本海默和斯维司泰克(Lalman, Oppenheimer and Swistak 1993)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在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科学的贡献中,其分析上的创新完全掩盖了其经验上的成就。^①

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常常缺乏对经验性应用进行阐述的兴趣。多数批评集中于理性选择关于人类心理学和理性的假设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意识形态后果上。1986年以来出版的四本厚厚的文集验证了这一倾向:第一本是理性选择理论专题讨论会文集《理性和社会》(1992年10月),虽然某刊物上的广告说“它的出版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注释和经验性应用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场所”,但在整部书中,无论是辩方还是驳方,没有一位撰稿人谈到理性选择模式经验上的成功或失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由克尔曼和法拉拉(Coleman and Fararo)编辑的《理性选择理论:提倡与批评》一书中。埃尔斯特(Jon Elster 1986a)编辑的论文集《理性选择》和门罗(Kristen Monroe 1991)编辑的《研究政治学的经济学途径》谈到了经验性议题,但是它们都不是有意识地对理性选择学派进行经验性评估。

本书的焦点是评价理性选择理论的经验性能力。我们坚持认为,一旦探求理性选择的文献为我们理解政治学贡献了什么时,政治科学中为理性选择方法欢呼的大吹大擂就显得很幼稚。理性选

① 拉曼等人认为,“正式结果的主体和它们在经验上的检验已经有了平稳的增长”(p. 82),而正规理论的模式已一次又一次地引导出统计模式的更好规范,甚至引导出被预估的规范功能形式的要点。许多新的(有时不明确)关系通过正规模式的使用而得到揭示(p. 98)。不幸的是,这些断言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详细阐述。